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2.02.001

# 21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管窥

乔瑞金,张尚弘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一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在 21 世纪仍然表现出强劲的研究势头。总体来看,21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延续了其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制度、异化的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三方面的深入批判,从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出发,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弊端、问题及其根源,厘清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及其在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和人与人关系方面存在的新问题,寻求改善经济危机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困境的办法,对于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在英国的实现,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21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新问题;政治批判;异化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22)02-0001-10

聚焦资本主义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以降,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批判性阐释逐渐成为其研究的焦点。进入 21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发,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暴力干涉更加频繁,失业、贫困以及难民等问题日益严峻,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高涨,资本主义所滋生的新问题愈发突出。面对现实的社会危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通过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异化的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绘就了一幅具有英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的三维构图,揭露了资本主义现实困境的根源,彰显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

21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仍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新时代仍然保持旺盛,它仍然能对当今世界的局面给予科学的解释,在面对今天这些因资本主义体系而产生的贫困、失业等非正义问题时,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sup>[1]</sup>“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甚至比在 19 世纪更有

意义,马克思对我们理解环境和经济危机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的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对当代帝国主义认识的充分概念。”<sup>[2]</sup>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21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更加关注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结合,尤其强化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批判中的运用,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逻辑,诸如剥削、竞争性积累和金融泡沫,正活跃于当今资本主义中”<sup>[3]</sup>,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准确把握当前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状况。在他们看来,一方面,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是必然会发生的,因此,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失去重新构建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也不一定必然是革命的催化剂。正如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所说,新自由主义时代行将终结意味着资本主义气数已尽的说法应被谨慎对待,因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只是资本主义顺应历史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新自由主义或许可以被

**收稿日期:** 2022-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善本、善念与善为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18JHQ002)

**作者简介:** 乔瑞金,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后新自由主义”代替,但其背后运行的仍然是绝对的资本主义。<sup>[4]</sup>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弊端,这一弊端会随着其对利润的无限制贪婪逐渐放大,而经济危机作为这种弊端的外在表现,必然也会以其作用和覆盖范围日益扩大的形式得到表现,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无法通过内部的自我净化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因此,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唤起无产阶级新的革命意识,深化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 一、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

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理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然而,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保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制度,人道主义越来越变成同人民相对立的异化的东西,而这一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无限增值特性。在这一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了资产阶级“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sup>[5]</sup>的工具,成了同人民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成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阻碍。

(一)资本主义的侵略性扩张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灾难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沿袭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待遇的传统方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削弱了人民群众反抗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开展。面对现实,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被资产阶级营造的华丽外表所欺骗,他们坚持要回到每一个现实的人、回到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来看问题,坚持“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生活当中,以此来找寻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根源”<sup>[6]</sup>。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21世纪的资本主义同过去相比,看上去似乎好了很多,然而这一切仅仅停留在表面,经不起推敲和分析。资本主义虽然有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自我扩张的增长运动。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发展停滞现象,在商品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世界制造业基地向低工资经济体的转移未能抵消这一进程,

相反,后发工业化国家将其前辈的生产力收益压缩到越来越短的增长周期中,以加速的方式重新创造了新的发展问题。与此同时,资本转向了承诺会有更好回报的投机性企业,其结果是金融泡沫下的增长乏力,以及在大衰退的过程中留下的破坏性崩溃和无就业复苏的痕迹。<sup>[7]</sup>具体说来,一方面,整个世界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极端不平衡的态势,在西欧和北美这样的资本主义核心区域,先进的科学技术早已被广泛应用到了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大量的财富。不仅如此,核心区域的国家如英美法,他们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频繁地对亚非拉美等非核心区域的国家进行殖民和剥削,通过牺牲非核心区域国家的利益来为自身谋利,这就进一步导致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之间在资源享有、财富分配、劳动分工等方面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亦充满着不平等现象。这不仅表现在非核心区域,核心区域人民的日常交往、工作及生活状况同样没有保障。看似有所提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早晚会在下一次的危机中加倍流失,因为这些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手段,其目的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这一点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在其《安然破产与养老金危机》一文中,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分析和阐释。在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看来,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危机、贫困等不平等现象接踵而至,而资本主义又将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强加给人民大众,使得人民不仅没有实现资本主义标榜的美好生活,反而“被越来越富有的资产阶级抛弃”<sup>[8]</sup>。这是资本主义本质使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不人道的真实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得到满足,全球性的危机正在蔓延,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灾难。

为此,英国马克思主义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对失业、社会福利以及贫困等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揭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上述问题的根源性影响,并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人民大众当中重新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原则”<sup>[9]</sup>,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从而使社会更加适合一切人的生活和发展。

(二)大范围的失业体现了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方面的弊端

失业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成为“困

扰欧洲的幽灵”<sup>[10]</sup>,并一直延续至今。技术的变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工人阶级大量失去就业机会,裁员的威胁甚至波及到了中产阶级。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学者把希望寄托在新技术革命上,认为过去许多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技术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新技术可以挽救失业的危机。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任何经济法规定所有工人,甚至大多数工人都能从这些进步中受益”,“恰恰相反,随着更先进技术的采用,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收入被资本而非劳动力所占据,其结果是不平等加剧”。<sup>[11]</sup>在他看来,失业状况的日益加剧反映的其实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衰退,这种衰退会严重打击所有的工业国家。

面对资本主义渴望通过内部净化和自我调节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幻想,简·布雷曼(Jan Breman)指出,资本主义所谓的净化和调节,实际上是把经济危机的负担压在工人阶级身上,“资本永远不会付出代价,尽管它对此负有主要责任”<sup>[12]</sup>,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只会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资产阶级手里,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困境得不到任何改善,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会使他们举步维艰。因此,通过强调资本主义内部净化来宣扬其优越性的做法,其实质无非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目的是欺骗大众,使人民满足于现状,失去反抗的意识。在简·布雷曼看来,当前由于资本主义积极意义的丧失所引发的失业危机“实际上是结构性危机”<sup>[13]</sup>,工资低、受教育程度低、资源贫乏的工人阶级构成了过度拥挤的世界经济底层,如果不通过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结构来扭转这一局面,处于底层的劳动力会陷入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

(三)福利制度的异化显出资本主义对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漠视

21世纪这一问题还集中表现在以养老金危机为代表的社会福利问题上,统治阶级对人民许下的美好承诺早已行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每况愈下的收入和失去保障的晚年。罗宾·布莱克本以美国安然公司的倒闭为切入点,深刻揭露了养老金问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质。布莱克本指出,安然公司破产所带来的养老金问题相当严峻,但其中最受影响的仍然是工人阶级。布莱克本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解释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资

本主义的根本冲突存在于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安然事件证明,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股东和工人在安然事件中都是失败者。”<sup>[14]</sup>布莱克本指出,局内人是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他们将安然公司的高风险贷款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和基金经理,并最终转移给了大量的养老金计划持有者,即局外人,并且,这次事件因工人们间接或小规模的股东身份而不能被定性为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在布莱克本看来,虽然这次事件中工人亦是资本的所有者,但他们实际上仍是真正的局外人,因为他们对以他们的名义存在的资产缺乏真正的控制权,而这才是工人和有产者的本质区别。安然事件的发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得出的结论:“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sup>[15]</sup><sup>17</sup>

安然事件并不是个例,养老金危机正在困扰整个西方世界。“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养老金计划在过去十年被取消,这暴露出养老金危机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发现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整整一代人都面临着紧张的退休生活。”<sup>[14]</sup>在布莱克本看来,包括养老金计划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福利政策实质上都是非人道的,“安然的结果赤裸裸地展现了精英阶层的贪婪”<sup>[14]</sup>。事实证明这些政策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幌子,“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sup>[15]</sup><sup>18</sup>,决策者的出发点从来就是自身的利益和统治地位,他们将危机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毫无保留地通过各种手段转移给广大无产阶级,使人民大众的生活压力无限制地增大。“养老金恐慌反映出人们开始意识到,雇主一直在大规模地欺骗他们的员工”<sup>[14]</sup>,也就是说,这些福利政策不仅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暴露了资本主义对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漠视,这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基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从制度批判的维度上认为,“建设一个可以为穷人谋求社会民主福利的社会”<sup>[16]</sup>已经迫在眉睫。

(四)异化的社会制度导致工人阶级日益贫困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日益严峻,贫困的问题亦逐渐加剧。戈兰·瑟伯恩指出,一些深层次的贫困问题恰恰隐藏在了资本主义虚假繁荣的背后。一方面,日益尖锐的贫困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由于一味地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对人

的关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日益失衡”<sup>[13]</sup>,财富越来越多地被资产阶级占有,致使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民众的劳动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健康状态不但没有发生好转,相反还有可能因为战争、社会动荡等因素而下降。对此,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放在今天的工人阶级身上依然适用,工人们不仅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产,反而还会被自己生产的产物所控制,<sup>[17]</sup>这种劳动的异己性使得工人们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贫困的加剧是其必然的结果。尼克拉·金斯伯格(Nicola Ginsburgh)在反思工人阶级的贫困窘境后指出,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将贫困等同于个体选择和道德缺陷等手段,将贫困从制造不平等的结构转移到个人身上,进而掩盖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结构因素在贫困制造中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所累积的财富和财富的创造能力是之前无法比拟的,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顺应潮流建立了囊括福利、保险、医疗和救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甚至有不少工人阶级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了中产阶级。随着这一现象的逐渐增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把这一现象当成是贫富差距缩小的标志,认为“‘中产阶级’的扩张意味着贫困即将消失”<sup>[8]</sup>,甚至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已经缓和并趋于稳定。而事实是,“资本主义可能最终会导致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sup>[8]</sup>,因为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世界各国以及各国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被锁定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sup>[18]</sup>，“经济危机正在由大量财富从穷人转移到富人手中来解决”<sup>[13]</sup>。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一旦出现问题,危机势必会波及无产阶级,从而加剧无产阶级的困境,近年来西方经济危机频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剧增都有利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深陷“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漩涡”“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仍然是最有可能的结果”<sup>[8]</sup>。

由此可见,无论是全球性的危机、失业、社会福利降低还是贫困,都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制度的外在呈现,是其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剥削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撼动的主旋律,资本主义所推行的提高收入、落实福利、普及教育等政策实则都是其美化剥削本质的手段,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获取利益的最

有效方式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这同时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依赖。因此,工人阶级依然是可以撼动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是革命的主体,他们“有团结在一起的实力来打断、破坏并重新组织生产,从而将经济生活的轨道转向不同的方向”<sup>[19]</sup>。这也表明,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 二、异化的暴力政治批判

21世纪的暴力政治虽然不再以过去那种野蛮的以国家消亡甚至种族灭绝为目的的形式存在,但实际上仍然以新的更隐蔽更无人性的形式延续,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对市场的抢占、对资源的掠夺以及对世界领导权的贪婪等等。其中,作为异化的暴力政治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武装暴力干涉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屡屡上演。有鉴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结合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冷战后一系列武装暴力行为的实质以及在武装暴力中人民大众的悲惨状况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一)资本主义国家借人道主义名义武装暴力干涉它国内政是其异化的暴力政治的集中表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局面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频繁的帝国主义暴力干涉。“事实上,苏联解体后,全球暴力手段的不平衡已经加倍,霸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加急剧地向武力的方向倾斜”<sup>[18]</sup>,整个世界依然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下。对于上述状况,资产阶级代言人马丁·肖(Martin Shaw)辩称说,这样做是西方在承担全球领导的角色,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西方有历史责任承担这一角色,并且只有西方具备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以及进行这种统一所必需的民主和多民族机构以及文化,“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只有存在一个能够从各方的共同利益出发,能够对整个系统施加纪律的超级大国,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协调问题”<sup>[18]</sup>。对此,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西方强国所谓的责任,实际上是“他们对边缘化地区的霸权控制”,“他们从经济视角来论述世界体系……其结论必然是西方中心论的”,<sup>[20]</sup><sup>166</sup>这是明显的“将个人权力置于民族国家的领土权力之上”<sup>[21]</sup>的行为。所谓的国际新秩序明显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看似是强

大国家对贫穷国家的责任,实质上却是赤裸裸地干涉,这种干涉在一个由民族国家而非单一力量组成的世界中是不合理的。在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看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暴力干涉行径虽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本质却是非人道的,因为他们的根本指向不是寻求如何实现人的价值,而是建立在“无数的谎言、贪婪与帝国主义幻想”<sup>[22]</sup>基础上的,是在利益驱使下的对外扩张,是对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劳动力的无限制剥削。从手段来看,当前世界的暴力干涉手段更是与“人道”背道而驰。从结果来看,暴力干涉不仅没有为被干涉方带来平等和自由,相反,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二)对新帝国主义的反抗必将推进世界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和革命斗争的高涨

与暴力干涉相伴而生的是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和反战运动。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手段每进一步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增加,都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sup>[23]</sup>霍布斯鲍姆曾预言,如今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已经来到,即“社会的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石,正……处在重大的毁灭转折点上”<sup>[24]</sup>,因为资本主义单靠国内的资源和劳动力已经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它们只能采取暴力干涉的形式,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将侵略装扮成解放”<sup>[22]</sup>。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看似取得资本增长的背后,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而反战运动的不断出现正好说明了资本主义统治能力的下降。亚历山大·考科布恩(Alexander Cockburn)指出,“时至今日,反战运动在日常生活中依然鲜活地存在”<sup>[25]</sup>,多数人民将反战倾向作为总统选举标准的这一现象也显示出人民强烈的反战意愿。与此同时,反战运动的高涨有利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一方面,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使各国的无产阶级因为同一个目标又重新团结在一起,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并肩战斗。另一方面,反战运动的屡次失败除了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外,也说明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依然不够强大。帝国主义暴力干涉的不断升级,有利于重新唤醒无产阶级潜在的革命意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望再次联合起来。对此,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认为,暴

力政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逻辑不仅无法阻止武装暴力干涉,反而需要通过暴力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行。在他看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人道主义干预……来掩盖特殊利益或权力图谋”<sup>[21]</sup>,这些行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资本主义殖民运动在当代的表现形式。

总体来看,对新时代国际暴力干涉行为做理论与现实的观照,是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从他们的分析和批判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的暴力政治行为实际上是在“新军国主义背后的帝国主义现实上覆盖了一层人道主义面纱”<sup>[18]</sup>,是以实现人的权利为名,行扩大势力范围及谋求自身利益之事,是不合乎正义、不合乎人道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国际关系和秩序的混乱,对当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英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站在真正地尊重与维护人的权利与自由的立场上,对当今世界暴力干涉行为的本质进行了揭露,这对于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有所裨益。

### 三、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

资本主义异化的意识形态包含了诸多内容,其中女权问题、对人的现实关怀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成为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较为关注的主题。

(一)权利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尤其是妇女权利的不平等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基本思想,其中,女性本应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地位和权利的思想早已成为共识。然而,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女性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同等的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女性权利的关注秉持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思想理路,他们通过对女性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家庭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劳动性别分化的关系的长期详细考察,结合自身的思考,试图对女性在当前资本主义环境下所面临的困境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找到使女性摆脱困境的可行路径。立足于对传统底层视角的坚守,英国马克思主义发现,过往的和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女权主义几乎都是将视野放在社会的中上层,而非数量更加庞大的底层贫困女性。这种审视视角的断层很容易造成难以触及全球化浪潮的底层女性在女权主义的“全球化视野”中

的缺失,从而使女权主义背离其原本的含义,逐渐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因此,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以恢复人的基本权利为目标对女权问题进行的思考,基本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坚持从历史主义的审视视角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异化。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曾指出:“女权主义不仅仅考察家庭历史,而且寻求解释,为什么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者的女性工人,以及她们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的服务,长期都不被重视。将女性带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我们关于生产,关于工人阶级政治和文化,关于阶级斗争,关于福利国家的知识,将会改变。”<sup>[26]</sup>苏珊·沃特金斯通过反思21世纪之前的女权运动,认为当代女性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性别分工和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西方的霸权主义模式虽然还远没有普及,但在公共领域都实行了男性的统治”<sup>[27]</sup>,这使得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全面的劣势地位。米切莉·巴雷特(Michelle Barrett)则指出,“必须注意到性别分工并不全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它的一些因素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只不过资本主义使性别分工更加顽固而已。”<sup>[28]</sup><sup>[28]</sup>在她看来,不能仅从资本的角度或仅从家庭的角度讨论妇女的受压迫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思考性别与阶级问题,搜集和分析女权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实和问题,有利于我们对女权主义的现状给出更加客观和合理的说明。丹·基思(Dan Keith)在认识到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后指出,虽然女权主义已经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日益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但是在当下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占实际支配地位的仍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因此,在社会实践或者行动团体中,性别歧视总是在不经意或被动的情况下频频发生,女性的受压迫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将已被资本主义置于边缘地位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重新拉回历史的中央,找到其遭遇的发展困境,并使其在同其他解放意旨的对话中获得新发展,是很有必要的。<sup>[29]</sup>苏珊·沃特金斯通过追溯和对比1790年至1900年之间的女权主义运动,着重强调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权运动的历史地位,指出这场运动“是在一场更广泛的斗争浪潮中兴起的,这场斗争注入了女权主义的语言,并帮助塑造了它的视

野”<sup>[27]</sup>。在她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女性,由于受到各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影响,广大无产阶级的女性也受到启发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其次,女权运动已经不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的运动,而是发展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世界性的运动。最后,女权运动没有停留在过去的形式上的反抗,而是付诸于实际行动。基于此,沃特金斯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思考不应再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而是应该建立一种历史的、超越阶级的、全球性的视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势不可逆,歧视、压迫以及不平等将会是全球女性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基于某一阶段对女权主义的考察是不全面的。只有从历史的整体的视角出发,全面把握女权主义的内涵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联系,才有可能为女权运动的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

其二,立足于女性的现实生活对资本主义权力异化的批判。沃利·塞科姆(Wally Secombe)分析指出,21世纪之前的女性仍然以家庭妇女为主要的存在形式,在家庭中从事着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是“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组织和斗争的大量劳动人口”<sup>[30]</sup>,由于行动缺乏有纪律的组织和完善的指导思想,她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形式,因此她们的斗争一般都是被直接镇压或不了了之。维罗妮卡·席德(Verónica Schild)指出,这些“家庭妇女”是组成无产阶级的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需要依靠的目标,女性“不仅追求收入和物质保障,而且追求尊严、自我完善与传统权威的解放”<sup>[31]</sup>,她们也同工人阶级一样,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获得真正解放为最终目标。21世纪后,从进入全球工资劳动大军的数量和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等多角度看,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女性作用和贡献不断提高的光鲜外表下,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仍然屡见不鲜,女性要实现真正的解放依然任重道远。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指出,女权主义不应该把妇女看作抽象的与男性无性别差的个体,而应该把妇女放在她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妇女解放就是要改变这些关系”<sup>[28]</sup><sup>[30]</sup>。考察女性的现实生活,有利于更好地发掘隐藏于生活外表背后的女性独有的特征和文化,帮助女性更好地看清她们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唤醒女性的抗争意

识。同时,立足女性的现实生活也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的基本立场,这更有助于女权运动摆脱来自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其他持不同立场的女性思想的干扰,使女权运动找到真正科学的指导思想,明确继续斗争的目标。

苏珊·沃特金斯指出,女性地位的提高彰显了女权主义的积极意义,也为今后女权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女性地位提高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其他社会问题,“性别平等的进步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日益不平等齐头并进”<sup>[27]</sup>。在她看来,一方面,那些进入工薪阶层甚至是精英阶层的女性,绝大部分来自资产阶级内部,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女性逐渐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使她们有精力进入社会,而这些女性的加入又大大扩充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然而与此同时,占据更多人数的无产阶级妇女可能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苦苦挣扎,她们并没有因女权主义而获益,这样一来产生的后果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女性与无产阶级的女性的差距不断拉大,全世界女性整体的贫富状况日益不均。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广大无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即使提高,也依然不会改变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命运,甚至女性还会受到来自于男性的歧视和压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并不具备真正解放妇女的条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第二波浪潮引发的文化变革本身是有益的,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合法化,而这种转型与女权主义者关于社会公正的远景背道而驰”<sup>[32]</sup>。因此,“这场运动需要将女性的不服从、乌托邦式的幻想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女权主义者必须进入政治领域,她们也必须把控制社会生产作为自己的关注点”<sup>[33]</sup>,也就是应该通过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寻求对资本主义权力异化的反抗。

### (二)现实的资本主义漠视对人的生命关怀

针对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新自由主义的运行逻辑使资本主义世界下意识地在维护企业生存和保证人民健康之间选择了前者,这使得本就脆弱的个人在残酷的病毒面前更加无助,人类的生存状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an)指出,疫情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迫在工作和饥饿之间做出选择,雇主要求他们在没有适当的社会距离或个

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工作,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雇主甚至要求出现症状或者检测呈阳性的员工继续工作,这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无疑是巨大的摧残。<sup>[34]</sup>在弗格森看来,受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影响,包括卫生和社会护理工作在内的许多社会人都不得不面对一种“道德困境”,即一个人知道该做什么正确的事,但体制上的限制使人们几乎不可能采取正确的行动。<sup>[34]</sup>

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主编约瑟夫·库那拉(Joseph Choonara)则采用整体主义的视野,从当前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视角对疫情问题进行了审视。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局势面临着三重危机,疫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能孤立于更广泛的生态和经济混乱来理解它。资本主义长期的萧条阶段并不只简单地造成了反复的经济危机,它还迫使资本对脆弱的生态系统进行更深层次地入侵,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新冠病毒正是通过资本的渗透和对自然的商品化,从动物群体进入人类社会的<sup>[35]</sup>。同库那拉一样,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也进行了相关方面的思考,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经济、政治和生物的多维危机中崩溃,正如拜登政府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写给员工的信中所说,如果你过去几周里听过拜登总统的讲话,你就会知道他谈论了“四次历史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气候性危机、系统性种族主义危机和已经持续50年的经济危机,而这相应的后果是霸权危机,即资产阶级统治的主导形式的衰败。<sup>[36]</sup>可以看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新冠疫情不但将新自由主义运行逻辑的弊端无限制放大,还暴露出新的问题,即原本隐藏在“繁荣”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公共健康领域的运行机制,同样是一种对于人权的违背。

(三)种族歧视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化

种族歧视问题是同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历史性问题,它根源于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张的本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人民的生存危机日益加深,种族歧视再一次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种族歧视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被激化和放大,其影响力已经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有必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为了人类获得解放,种族歧视必须被摧毁。<sup>[37]</sup>苏亚塔·吉德拉(Su-

jatha Gidla)和艾伦·霍恩(Alan Horn)在《新左派评论》发表的文章《种姓、种族和阶级》中指出,种族问题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基于血统或不可改变的特征对人的价值进行排序的传统的延续,它通过使用严格控制的边界来保证一些群体对其他群体的优越性,使他们都处于各自制定的位置。这一概念映射到美国就是白人是“统治者”,亚洲人和拉美人是“中间层”,非裔黑人处在底层。<sup>[38]</sup>同理,在他们看来,这种类比也适用于英国、德国乃至全世界存在种族歧视的地区。吉德拉和霍恩通过梳理种族歧视的形成机制,指出种族歧视的出现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相信社会等级制度是由上帝规定的;角色与等级的世袭性质;禁止跨种族通婚;将最低阶层与污染联系起来;“清洁”与“肮脏”的职业等级制度;对低下阶层的污名化和非人化;相信优势和劣势的与生俱来;以暴力的形式执行上述规定。<sup>[38]</sup>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上述要素的催化作用还会被进一步放大,使得“不同阵营”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这势必会导致“种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因此,在他们看来,对抗种族歧视,除了坚持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外,还应提倡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种族歧视的施为方需要被唤醒,需要让他们明白种族歧视对于人类生存和未来社会发展所构成的危害”<sup>[38]</sup>,另一方面,打破工人阶级中黑人劳工和白人劳工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建立一种和谐的对话关系,进而确定他们作为工人的共同利益,这样一来,剥削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sup>[38]</sup>。

总而言之,对女性问题、疫情和种族歧视的思考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抱负的中心位置的一次积极尝试。通过发掘女性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及重建女性日常生活的完整性,英国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现有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局限性;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面对疫情的态度及其应对措施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漠视;通过对因疫情而加剧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看到了大量底层人民在种族歧视下的巨大痛苦。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做到“在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种族阶层中实现性别平等”<sup>[27]</sup>,只有摆脱资本主义的体系框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变革,才能破除异化的意识形态,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 四、结语

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将制度批判、价值批判和人道主义批判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一种全新解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审视资本主义问题的一种全新发展。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异化的暴力政治批判和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三个方面构成了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核心框架。其中,异化的社会制度呈现出新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所面临的多重不平等的新局面;异化的暴力政治揭露出资本主义暴力政治新秩序下人的新困境;异化的意识形态则体现了社会权力构造维度下的人的基本权利问题。

首先,异化的社会制度批判彰显了“从下往上看”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人”思考方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底层人民的现实状况。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了经济危机对富裕国家的影响上,“对生活在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民众却没有多少关注”,“而这种思路只分析了危机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却掩盖了危机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影响”<sup>[13]</sup>,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影响。其中最生动的体现,就是无产阶级在面对失业、社会福利的丧失和贫困这些不平等问题时的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这就是许多穷人越来越容易受到各种意识形态诱惑的原因,因为“他们很想把它看作是一种摆脱对他们来说是死胡同的出路。”<sup>[39]</sup>对异化的社会制度的关注,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表明只有立足于广大人民,倾听民众的真实诉求,看清民众的真实现状,才能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笼,消除异化的社会制度,进而建立“一种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社会秩序”<sup>[40]</sup>。

其次,异化的暴力政治批判是破除资本主义霸权的全新尝试。英国马克思主义对新时期异化的资本主义暴力政治的关注,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全球视野。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利润、剥削和压迫是主旋律,它“摧毁了人们旧的生活方式,任由他们在缺乏相应能力的情况下自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却很少告诉他们怎么办”<sup>[41]</sup>,工人生活的任何稳定都可能是暂时的,统治阶级除了自己的私利,没有别的优先

考虑,因此,一旦危机出现,承受最大痛苦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而英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其内部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入考察,思考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把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瘟疫中解放出来”<sup>[42]</sup>,进而“建设一个可以为穷人谋求社会民主福利的社会”<sup>[16]</sup>,一个可以真正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发展和彻底解放的社会。这不仅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也是新时代破除资本主义霸权的全新尝试。

最后,异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英国马克思主义“希望给予所有人应有的权利”<sup>[43]</sup>,因此,关注女性的异化和生存状况,考察疫情所凸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困境,审视种族歧视的社会危害,都是其思考人的全面解放问题所不能规避的重要方面。因此,从上述三个视角切入资本主义对人的影响,有利于更加立体地把握人的现实处境,是21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的全面解放立场在新时期的具体呈现。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制度、异化的暴力政治和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分别从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三方面,展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立体审视。他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为出发点,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弊端、问题及其根源,寻求改善经济危机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困境的办法,为打破资本主义的桎梏而斗争。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探索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全新尝试,值得予以深入思考和研究。

#### 参考文献:

- [1] CALLINICOS A.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Karl Marx[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2.
- [2] BLACKLEDGE P. Marx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J].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010(24): 160-168.
- [3] 俞吾金.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3[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51.
- [4] WATKINS S. Paradigm shifts [J]. New left review, 2021(128): 5-2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8.
- [6] 李文艳, 乔瑞金. 马克思平等观念的核心内容[J]. 哲学

动态, 2019(8): 41-48.

- [7] ZACARÉS J M. Euphoria of the rentier? [J]. New left review, 2021(129): 47-67.
- [8] THERBORN G. Dreams and nightmares of the world's middle classes [J]. New left review, 2020(124): 63-87.
- [9] 刘 烨, 乔瑞金.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思想探析[J]. 学习与探索, 2018(11): 23-34+191.
- [10] GLYN A. Social democracy and full employment [J]. New left review, 1995(1/211): 33-55.
- [11] BENANAV A.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 1 [J]. New left review, 2019(119): 5-38.
- [12] BREMAN J. A bogus concept? [J]. New left review, 2013(84): 130-138.
- [13] BREMAN J. Myth of the global safety net [J]. New left review, 2009(59): 29-36.
- [14] BLACKBURN R. The Enron debacle and the pension crisis [J]. New left review, 2002(14): 26-51.
- [1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6] 林小芳, 查君红. 塔里克·阿里谈拉丁美洲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新进展[J]. 国外理论动态, 2005(3): 20-22.
- [17] HARMAN C. Zombie capitalism: 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0: 12.
- [18] ANDERSON P. Force and consent [J]. New left review, 2002(17): 5-30.
- [19] 阿列克斯·卡利尼克斯. 反资本主义宣言[M]. 罗汉, 孙 宁, 黄 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70.
- [20] HOBBSAWM E.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1] CHANDLER D. International justice [J]. New left review, 2000(6): 55-66.
- [22] ALI T. Re - colonizing iraq [J]. New left review, 2003(21): 5-19.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7.
- [2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M]. 郑明萱,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703.
- [25] COCKBURN A.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anti - war movement? [J]. New left review, 2007(46): 29-38.
- [26] 丹尼斯·德沃金.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 历史, 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M]. 李风丹,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268.
- [27] WATKINS S. Which feminisms? [J]. New left review, 2018(109): 5-76.
- [28] 陈学明.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第3卷[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 [29] MAIGUASHCA B, DEAN J, KEITH D. Pulling together in a crisis? Anarchism,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left - wing convergence in austerity Britain[J]. *Capital & Class*, 2016(40):37 - 57.
- [30] SECCOMBE W.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J]. *New left review*, 1974(1/83):3 - 24.
- [31] SCHILD V. Femin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J]. *New left review*, 2015(96):59 - 74.
- [32] FRASER N.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J]. *New left review*, 2009(56):97 - 117.
- [33] HAUG F. The woman's movement in West Germany[J]. *New left review*, 1986(1/155):50 - 74.
- [34] FERGUSON I. Capitalism, coronavirus and mental distress [J/O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20(168). [2021 - 11 - 10]. <http://isj.org.uk/coronavirus-mental-distress/>
- [35] CHOONARA J. A year under the pandemic[J/O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21(169). [2021 - 11 - 10]. <http://isj.org.uk/a-year-under-the-pandemic/>
- [36] CALLINICOS A. Neoliberal capitalism implodes: global catastrophe and the far right today [J/O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21(170). [2021 - 11 - 10]. <http://isj.org.uk/implodes-catastrophe/>
- [37] CHOONARA E. Racism: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J/O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20(168). [2021 - 11 - 10]. <http://isj.org.uk/racism-institutional-structural/>
- [38] GIDLA S, HORN A. Caste, race—and class? [J]. *New left review*, 2021(131):15 - 35.
- [39] BREMAN J. The undercities of karachi [J]. *New left review*, 2012(76):49 - 63.
- [40] 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M]. 李惠斌, 杨雪冬,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52.
- [41]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工业与帝国[M]. 梅俊杰,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80.
- [42] STREECK W. Engels's second theory [J]. *New left review*, 2020(123):75 - 88.
- [43] 罗宾·布莱克本. 未完成的革命[M]. 李晓江,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43.

## On the Pol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Capitalism of British Marxism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QIAO Rui - jin, ZHANG Shang - hong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ol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capitalism has always been a core argu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British Marxism, and it still shows a strong momentum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olitical criticism of British Marxism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continues its holistic way of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in - depth criticism against capitalism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alienated social system, the alienated violent politics and the alienated ideology, the political criticism of British Marxism bases itself on the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of man's all - round liberation. By exposing a series of drawbacks and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ir causes, the criticism clarifi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and its new problems in social, international and human - to - human relations, and seeks to improve the plight of society and people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critic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ursui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ocialist system in Britain and the promotion of humans' free and all - round development.

**Keywords:** British Marxism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problems of capitalism; political criticism; alienation

(责任编辑 郭郁 责任校对 郭郁)